



星座副刊第116期

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日见报  
投稿邮箱：  
P. O. BOX A555, Kenyalang Park  
93800 Kuching, Sarawak.  
投稿邮箱：  
xingzuo70@gmail.com



林武聪

# 遥想星座诗社： 文学的、艺术的、思想的

砂拉越星座诗社要推出一个40周年纪念特辑，邀我这个前主席写一些感言。我有些惊讶：真的有40年了吗？时间过得可真快。据我所知，星座诗社于1970年在古晋注册，1971年举行成立典礼。我在1985年才开始参与诗社的活动，来不及见证诗社成立初期的轰轰烈烈，算是后来者了。我还记得，诗社曾在1991年举办20周年纪念文学激荡系列活动，想不到一晃就接近20年了。我自1997年起就因工作关系一直留在西马，一年只回去家乡古晋几次，没有什么机会参与诗社的活动。这几年从网站与报章上得知诗社又再活跃起来，心里颇有感触。

我总觉得，星座诗社虽然只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文学团体，但动静自如。几个爽快的朋友凑在一起，策划一些活动，说做就做，没有太多顾虑。诗社里的执委来来去去，老的退下来，年轻的接下担子；许多年过去了，诗社就这样生存下来。诗社一向来不只举办文学节目，也配合本土情况而推动其他艺术、文化与社会活动。然而，每次我和几位老星座谈起，总觉得大家在心里还是以文学为依归。毕竟，当初星座诗社的成立，是标榜提倡现代文学的精神：突破框框，开拓新境。时至今日，文学论者都说现代文学已经死翘翘，但是在老星座心里，求新求变求好的文学精神，理应不死。我还记得，诗社曾在古晋的多家报章主持文艺副刊，副刊的版头常用社徽（以小熊星座为图案）作招牌，旁边还附上几个字：文学的、艺术的、思想的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星座诗社的口号或理念，也不晓得当初的执委会可曾开会讨论后才接纳它。诗社里似乎也没有人为它提供详细的诠释，但它却仿佛是我们大家都认同的定位或路线。以文学为先，视它为艺术，也要提升思想，我自己心下是这么想的。

诗社在1991年所举办的20周年纪念文学激荡系列，节目包括国语与华语现代诗朗诵比赛、文学与政治讲座会、文学交流会、笔谈等等。其中的笔谈是邀请几位老星座针对砂拉越星座诗社的过去、未来与现在这一课题写下看法，然后编成特辑，刊于古晋的国际时报（1991年12月28日）。我手头上还有这份剪报，前几天重看了一遍，觉得有两段话很有意思，也很有概括性，忍不住要和大家分享，也可藉此回顾20年前的看法。星座诗社前主席黄泽荣说：星座诗社的实质精神在于破除旧框框，不断探索和开拓新境。星座诗社是艺术的，也是思想的。过去20年偏重把艺术精神通过文学创作来体现，思想层次的提升之鼓励工作显然匮乏，未能平行发展成为有艺术纯度，也有思想深度的启蒙组织。期望通过诗社，不只是能培训更多独立特行、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写作者，且能带动文艺青年对时势事态作出关怀和思考，写出掷地有声的作品来。诗社第一任执委之一的谢永就说：办文艺活动是一项植林的工作。诗社应在这项工作中保持过去大胆求新的精神，让生态各异的各种花树，选择适当的地势生长。最好不要尝试将文艺创作必须和什么扯上关系，或和什么不可扯上关系。我们怎么能忍心要一颗年轻的心未老先衰，非议他写情写爱，正如我们不能去苟同一颗创作心智停止成长的病态？其实写些什么题材都可以产生杰出的作品，只要写得情真和超众。这两段话可见出老星座对文学的抱负与基本态度，或可作文学的、艺术的、思想的这一理念的注脚。

我始终相信，文学创作是十分个人的心智活动。参加星座诗社，协助举办活动，对个人而言主要还是一种社会参与，为了推广文学而付出时间与精力。若说个人能有什么收获，最宝贵的还是诗社同仁之间无所顾忌的交往、文学资讯的分享、文学观点的碰撞，以及各种活动对本身在文学体验方面的启蒙、刺激或提升。各种文学活动的喧哗过后，个人还须回到书桌旁，静静阅读，静静书写，甘于寂寞而后才能有作品产生。而所谓功夫在诗外，随著阅历的增加，写作者必会发觉，文学功夫不只限于文字掌握与书写技巧，也还需要更广泛的知识，丰富的人生感悟，开阔的眼界、豁达的胸襟、敏感的心灵。老星座或像我这样不太老的一辈（或不认老？），40年或20年来，因各人的际遇不同，对文学的态度也当然有所改变，这应该是很正常的现象。然而，如果我们对文学仍然旧情难忘，仍然有所期盼，那么，对文学的欣赏或创作就不会完全不在乎，反而会有不同的要求。

老星座之中，永就写诗最具个人风格，也最能坚持。他早年出版过诗集《悲喜集》与《站卡》。大概两年前吧，他把个人比较满意的作品挑出来，不断修改，精益求精，辑成一册。他也把一份诗稿交给我，要我提出一些意见。我重复读了又读，读著精致浓缩的诗语言，有些是我已经熟悉的，有些是他近年来的新企图。我感觉他有一个自足的诗的世界，就诗而言我几乎难以挑出什么不足之处，却是久久无法下评。后来我向他提起，他却摇摇手说：不要去管那些了。我知道他又有了新的体悟，又要让自己的作品更上一层楼了。

我想我可以了解永就的心情。这些年来，我对自己的诗也不满意。更甚的是，我读其他许多诗人的诗也不甚满意，但是我把那种感觉藏在心里，不敢说出来。有一天，我读杨照的书《迷路的诗》（台北：联合文学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里边有一篇文章《在有限的温暖里》，其中有几句话仿佛说中我的心事：什么时候停止写诗的？有一些别的事情干扰著我的浪漫诗人梦幻。我的诗，别人的诗都少了些什么，一些我愈来愈觉得不应该缺少，偏偏却无以掌握的东西。该怎么说呢？我在那一刻看穿了诗与诗人的荒芜本质。诗里没有人问公理与正义的问题，诗人无法回答最简单的公理与正义不存在的怀疑。

真的是荒芜的本质吗，诗与诗人？我感到沉重，像我每次回乡的感觉。回到老家翻阅家乡的报纸，听家乡的朋友说起许多故事，总感觉有一种郁闷的氛围。我想起我熟悉但遥远的家乡，想起这几年来在互联网上读到的关于家乡的种种资讯，总觉得有许多同乡人的内心世界我无法真正走进，总感到他们有满腔欲说还休的愤懑。为什么呢？我无法肯定。是因为长久的劣质政治？虚浮的社会风气？封闭的文化环境？公理与正义的实际阙如？不是说现今的世界已经资讯发达，社会已经开放进步了吗？为什么我感觉中的家乡却像是一只患了忧郁症的猫咪？为什么我写不出她的忧郁？要写出自己满意的诗真的这么困难吗？我又记起张景云先生曾为《有本诗集》（吉隆坡：有人出版社，2006年）写过一篇序文《语言的逃亡》，其中有不少令人深思的话：今天的诗人第一不能不关心诗的语言（的美学含义），第二不能不关心大政治，这个大政治关涉到人类语言的前进，也就是诗人这个行业的前途。社会控制手法不断翻新，今天唯有诗的鸵鸟才会说，大政治与我无关。在我看来，这篇序文是马华诗坛的一篇重要文献。我读它仿如读一首现代诗，读到结尾时尤其感到沉重：阿尔道斯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正一点一滴的渗入我们的世界，可怕！百年后的世界，万人之中一人是统治阶层，一人是自由思想逃亡者，其余都是奴隶。诗人，做好你的自由思想逃亡者吧！

杨照的荒芜说，张景云先生的大政治说，对有心于文学的人来说或许刺激或刺痛的作用。然而我想来想去，在感觉沉重之余却有一个顾虑：如果我在不经意间让年轻的诗社朋友感觉到原来文学这么沉重，那岂不是把他们吓跑了？所谓沉重是不是自己年岁痴长后才有的的一厢情愿？永就的笔谈不是说过了吗：我们怎么能忍心要一颗年轻的心未老先衰？其实，文学千姿百态，可重可轻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创作或欣赏文学应该可以有更大的包容性与灵活性，不必执著必须这样或必须那样，或让文学理论牵著鼻子走而无法收放自如、游刃有余。对于文学的感悟，我自己也有一次眼高手低的体验。几年前台湾大学的张健教授曾在新纪元学院当客座教授一个学期。有一天我有机会和他谈到写诗的体验，我说自己很在意每一句诗是否有足够的诗质，是否有存在的必要。他笑笑地说：哦，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。我那时心下颇不以为然，觉得他倚老卖老。他在马来西亚逗留的两三个月期间，写了几百首诗，把两本练习簿子写得满满的。当然我不觉得那些诗特别好，但是后来想想，他写诗写得自然轻快，我一年里写那么几首诗，刻意而沉重，其间功力的高下之分已然明显不过。也想起几年前在新纪元学院举办的一场文学研讨会中，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曾提到一个阅读乐趣的感悟。他说有一天在课堂上为学生分析小说，自己说得头头是道、兴高采烈，却突然看到班上的学生个个脸色凝重；教授至此惊觉：把小说过度分析或诠释，反倒使人失去阅读的乐趣。小说如此，其他文类或艺术形式何尝不是？曾看过电视节目主持人访问周星驰，问他对他的影片《功夫》评价如何。周说：好看！我心里想：为何我不能写出好看又受好评的诗？好看的文学作品不一定都媚俗、都缺乏艺术的深度或思想的厚度吧？

所以，年轻的诗社朋友，如果我们的家乡真有许多忧郁，如果未来的世界真的非常可怕，如果倚老卖老的写作者处处显得沉重，那么，就用你们年轻的心、年轻的文学去对抗吧！人生有忧有喜，世界可怕又可爱，都等著你们去体验。文学的未来，或轻或重，或美好或荒芜，就靠你们的努力了。然而，对于老星座或不太老却不再年轻的星座朋友，包括我自己，我还是想说：这么多年了，如果我们还没死，还有感觉，我们怎能忍受创作心智停止成长的病态？顾后瞻前，反思当下，如果我们还记得文学的、艺术的、思想的，难道我们还不能看透：我们的文学曾经年轻，但文学心智的成长终须面对无可回避的沉重？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不可能再有另一个40年；何不赶紧从沉重之中破茧而出，以一身轻装，重新上路？

（2009年10月7日）